

西夏文《六韬》译本的文献价值

邵 鸿 张海涛

内容摘要:本文比较了西夏译本和宋代形成的今本《六韬》在分卷、篇目、文字方面的差异,进而探讨了西夏文《六韬》的文献价值。认为宋元丰年间《武经七书》颁布后,虽然具有正统和支配地位,但并没有立即完全取代其他版本,直到南宋时期还有一些与官本不尽相同的《六韬》流传于世。西夏译本即为其中之一,但它不是宋明以来主要《六韬》版本的祖本并且较早亡佚。然而元丰时期的官方定本《六韬》有可能是在包括西夏译底本在内的多个版本基础上整理校定的,其改变程度可能没有过去认为的那么大。此外,西夏译本《六韬》还有一定的训诂学价值。

关键词:西夏文《六韬》文献价值

1909年沙俄科兹洛夫考察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所获文物中,有西夏文刻本《六韬》残本一种。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,编号为 ИВВ. № 139、140、141、142、768、769、770,初次著录见戈尔巴乔娃、克恰诺夫于1963年合著的《西夏文写本和刊本》^①。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(第11册),公布了该刻本照片,为相关研究创造了条件。随后,聂鸿音、林英津、宋璐璐、贾常业等学者先后对西夏文《六韬》进行了译释和探讨^②。他们的工作,基本解决了西夏文字方面的问题,在此基础上对西夏文《六韬》的文献学价值也有所论述。笔者研究《六韬》有年,苦于不通西夏文字而不能直接研读西夏文译本(以下简称“夏译本”)《六韬》,最近认真拜读了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,深受教益,同时也有一些心得。爰成此文,以求教于方家。

①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资料室编译《民族史译文集》第3集,1978年。

②聂鸿音:《〈六韬〉的西夏文译本》,《传统与现代化》1996年第5期;林英津:《西夏语译〈六韬〉释文札记》,《辽夏金元史教研通讯》,2002年第5期;宋璐璐:《〈六韬〉西夏译本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硕士论文;宋璐璐:《西夏译本中的两篇〈六韬〉佚文》,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1期;贾常业:《西夏文译本〈六韬〉解读》,《西夏研究》2011年第2期。

我们知道,《六韬》成书于战国,中古时期仍广为流传,篇幅较大,内容庞杂。北宋元丰年间(1078-1086),为适应当时的军事需要,神宗下诏校定《武经七书》,经何去非、朱服等人的整理,最终形成了6卷60篇文字整齐简练的今本《六韬》,并刊刻颁行。此后今本流行,而中古本《六韬》则逐渐湮灭^①。西夏文译本是《六韬》迄今唯一已知的非汉语文本,时代亦早至南宋前期,其珍贵自不待言。

西夏文《六韬》为蝴蝶装刻本,版框13.5×18.5厘米,每半叶7行,行16字。版心题“六韬上”,或“六韬中”,下有刻工姓名及汉文页码。聂鸿音根据刻工题名,考定《六韬》是西夏乾祐年间(1180年前后,是年为南宋孝宗淳熙七年)的一个官刻本^②。刻本严重残缺,惟存26叶,不计重复,仅得18个整叶和4个半叶,但叶面保存基本完好,字迹清晰。现存部分为“卷上文韬第一”的篇目及“文师”、“盈虚”、“国务”、“大礼”、“明传”、“六守”、“守土”、“守国”;“卷中龙韬第三”的“兵征”、“农器”;“卷中虎韬第四”篇目及“军用”、“军略”、“一战”、“临境”以及存疑的“攻城”篇。所存各篇,或完或残,程度不一。

根据残存内容可知,该译本所据底本应是一个分为上中下3卷,文武龙虎豹犬六韬齐全的汉文《六韬》。各位研究者均认为,这个本子属于北宋以后流传的《六韬》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今本《六韬》,而与中古时期的《六韬》文本有显著区别。这个认识理据充分,笔者完全赞同,这里仅再举出一个极明显的证据:唐初《群书治要》卷31辑录《六韬》部分,相对而言是最能反映中古本《六韬》整体风貌的文本。与今本比较,全书首篇《文师》为书序,不属《文韬》;其收录篇目内容最多(占所辑《六韬》的三分之二,但也并不完整)的《文韬》,不仅内容上多出今本所无6篇,而且篇序、文字与今本差异亦较大。反观西夏译本,《文师》已归入《文韬》,《文韬》之篇目、顺序与今本全同,文字也几乎完全对应,其属今本系统可谓一目了然。

二

尽管西夏文《六韬》总体上说属于今本系统,但其与以《武经七书》本《六韬》(以下简称《七书》本)等宋明时期的主要版本仍存在着重要差异。

(一)卷数有异。

西夏文《六韬》为上中下3卷本,而北宋校定后的今本《六韬》,无论是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六韬》、《朱服校定六韬》,还是传世的宋刻《七书》

^①徐勇、邵鸿:《〈六韬〉综论》,《济南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3期。

^②聂鸿音:《〈六韬〉的西夏文译本》,《传统与现代化》1996年第5期。以下凡引述聂鸿音的见解,均出此文。

本、金刻《施氏七书讲义》本《六韬》(以下简称《施氏》本),全为6卷,其后明清主要刊本如明初《武经七书》刻本、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》本、孙星衍辑《平津馆丛书》本《六韬》等也多为6卷。不过,南宋郑樵《通志》著录有《太公六韬》5卷和《改正六韬》4卷。这说明,宋代《六韬》的官方定本虽为6卷,但同时也有卷数不同的版本流传于世。检刘申宁《中国兵书总目》,3卷本《六韬》始见于清代,但西夏文本证明,早在宋代已有3卷本面世。这是夏译底本和已知诸宋刻本一个显著不同之处,以往研究者似乎均忽略了这一点。

(二)篇目有异。

夏译本《六韬》完整保留了《文韬》、《虎韬》的篇目,前者共12篇,与今本完全相同;后者则为14篇,较之今本顺序相同,但多出两篇,即在“军略”后多出“一战”,“略地”后多出“攻城”。“一战”内容完整,共计289字,“攻城”则有目无文。但夏译《六韬》另有残页半叶(由于页码缺损,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将其编排在最后),存122字,不知归属,研究者多倾向属于“攻城”。林英津、宋璐璐已指出,“一战”和“攻城”的部分内容见于《通典》和《太平御览》所载《六韬》逸文^①;但宋璐璐认为,后者除了“高城深堑”四字之外,似乎和攻城没有太多联系,其文字为《通典》卷153“示怯”、《太平御览》卷294“怯懦”所摘引,因此这段文字“佚失的篇题似乎应该是‘示怯’或者‘示弱’之类,而不像是《虎韬》目录中的‘攻城’”^②。如果宋说不错,该残页则应属于其他已佚失的某韬。

今按:所谓“攻城”的残文,聂鸿音先生汉语回译如下:

“解……秉日月之道,明四季之常,执其左右首尾,则小大皆成,不至迷惑也。’武王曰:‘敌人先至以取我,彼先得地利,为之奈何?’太公曰:‘若如此,则故作怯懦而佯北,敌人必追,追之急则行陈乱而自相失。吾发伏兵疾击其后,车骑左右近攻,必破之。敌人高城深堑……’”

此段文字的主要内容,确实是谈如何示弱于敌,调动敌军从有利至于不利而击破之。不过,最后“敌人高城深堑”六字还是应加注意。因为上文至“必破之”所论已完,接下来应是另一层叙述。从语意上看,很可能是说敌人居于高城深堑中难以攻取时,亦可采取示弱方式调动敌军离开城池从而战胜之。因此,聂鸿音主张在没有发现其他材料的情况下,仍不妨把它算作是“攻城”,并非不可接受。至于宋璐璐关于其篇名应为“示怯”或“示弱”的主张,似难成立。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御览》之类的政书和类书,依类缀集古书文字,如果将其类名视为所集古书篇目名称,则各书篇目均相同,这显然是说不通的。

^①林英津:《西夏语译〈六韬〉释文札记》,《辽夏金元史教研通讯》,2002年第5期,以下凡引用林英津见解,均见此文;宋璐璐:《西夏译本中的两篇〈六韬〉佚文》,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1期。

^②宋璐璐:《西夏译本中的两篇〈六韬〉佚文》,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1期。

西夏文《六韬》多出的这两篇,最引人关注。聂鸿音说它们“无疑是西夏译本《六韬》最有价值的部分”,甚是。我们自然还可猜想,除此之外,夏译残损的武、龙、豹、犬四韬中极可能还会有少量今本不见的篇目,这的确意义重大。其不但足以证明,夏译底本应非北宋元丰官方校定颁行本,而是另外一个我们从不知晓的宋本,更为研究唐宋间《六韬》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和启示。

(三)文字有异。

西夏文《六韬》的文字和今本一致性极高,但并非完全一致。如林英津所说,“西夏译者是在相当精确的理解了上古书面汉语之后,做出的相当流畅的翻译”,但作为翻译文本,夏译本《六韬》在文字上与今本有所增减出入实属正常。然而,有些差异明显不是翻译所致,而与所据底本有关。这些差异对于文本校勘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,尤其值得关注。下面主要以贾常业回译为依据^①,分三类分别举例叙述之。

1.与今本文字不同可校正今本之误者。如:

(1)《文韬·文师》:“义之所在,天下归之。”

《七书》本、施氏本、《武经七书直解》本(以下简称《直解》本)“归”均作“赴”。按:此文前后谈及“仁之所在”、“德之所在”、“道之所在”,其后均为“天下归之”,惟“义之所在”下接“天下赴之”,故以“归”为是。银雀山西汉竹简本(以下简称竹简本)、《群书治要》卷31(以下简称《治要》本)及《太平御览》卷421引文均作“归”,西夏本正作“归”。

(2)《文韬·大礼》:“勿妄而许,无逆而拒。许之则失守,拒之则闭塞。”

《七书》本第一个“拒”字作“担”,显误。敦煌藏经洞唐代写本(以下简称唐写本)、《施氏》本和《直解》本不误,西夏本又增一证。

(3)《文韬·守土》:“无借人利器,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,不终其世也。”

《七书》本末句作“不终其正也。”银雀山竹简本、唐写本、施氏本、《直解》本均同于西夏本,作“不终其世”。

(4)《龙韬·兵征》:“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,用日长久。”

“用日长久”,据林英津回译。《七书》本作“用曰长久”;《施氏》本、《直解》本作“用兵长久”。贾常业直译为“日期多留”,但意译为“用兵长久”,忽略了其间差异。林英津指出:“‘曰’或系‘日’之误。至少,西夏译者看到的汉文本应有作‘日’者。”林说是。

(5)《虎韬·军用》:“张黑铁蒺藜,芒四寸,广八寸,长六寸以上。”

“长六寸以上”今本均作“长六尺以上”,然蒺藜显然不可能长至六尺,西夏本“六寸”更为合理。宋璐璐认为是西夏人误抄,非是。

按“军用”全篇叙述各种军器装备,大量涉及器物名称及其数量、规格,因

^①贾常业:《西夏文译本〈六韬〉解读》,《西夏研究》2011年第2期。以下凡引述贾常业的见解,均出此文。

此在各种中古文献的引文中常有出入,至今本出文字始最后定型,但也有不少于情理不合之处。夏译本篇与今本不同之处较多,特别是数字与今本颇有差别,有的可能有误,有的可以并存,有的则明显较今本为合理,上举二例即是。

2.与今本文字不同而可并存者。如:

(1)《文韬·守国》:“冬道藏,万物隐。”

《七书》本末句作“万物寻”;唐写本、《施氏》本、《直解》本俱作“万物静”。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云:“‘静’与(上文)‘荣’、‘成’、‘盈’等字为韵,宋本作‘寻’似误。”^①房立中云:“‘寻’字与‘静’字右部形似,宋本似因字残而误。”^②

按《七书》本“寻”字不通,“静”字是。贾常业认为,西夏本用“仓库”对应翻译其字,而“西夏文‘仓库’有‘隐藏’之意,故译为‘隐’。”贾译为“隐”,不一定确切,但可证明“寻”之非是。或许贾译是对的,因为字意可通,韵部亦协。而且从字形上看,“隐(隱)”字右部亦与“寻(尋)”字相近,故《七书》本也可能是由“隐”字致误。

(2)《文韬·盈虚》:“旌别淑德。”

同于《七书》本。但施氏本、《直解》本作“旌别淑慝。”施氏讲义释其为“旌别淑善邪慝之人”。“德”、“慝”音同可通假,而意正相反。文字上二者皆可通,但从前文数句均言表彰良善来看,《七书》本和西夏本“淑德”比“淑慝”似更切当。

(3)《文韬·六守》:“农、工、商,谓之三宝。”

此句今本各本均作“大农、大工、大商,谓之三宝。”唐写本同,唐宋类书中引用也不少。惟唐《意林》卷1引文没有三个“大”字,与西夏本一致。

(4)《龙韬·农器》:“天下安定,国家无争。”

“国家无争”,从林英津译。贾常业直译为“国家争无时”,意译为“国家无事”,意译微失本意。《七书》本、《直解》本作“国家无事”,林英津已注意到这一差别,认为可能底本如此。按《施氏》本同于夏译本,证明林说是。

在此还应指出的是,夏译本《六韬》中有一些异文因为缺乏书证,属于错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,如《文韬·文师》“施及三王”夏译作“施及二王”,“亲和而事生之”作“亲和而言生”,“国可拔”作“国不可拔”;《虎韬·军用》“电车”作“电军”,“车上立旗鼓”作“车上立旗矛”,等等。但这些异文仍然是有价值的,因为如果它们不是误译所致,则必是底本如此,故亦可注意。

3.相对今本有重要文字增损而有助于了解底本原貌。如:

(1)《文韬·文师》:“载与俱归,立为师,以勤问境中吉安。”

此为“文师”最后一句,古今包括大量引文在内的各种文本都是到“立为

^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,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^②房立中:《姜太公全书》,学苑出版社,1996年,第30页。

师”为止,只有西夏本多出“以勤问境中吉安”数字(相当于汉语“咨以国之所安”之类)。因此,其为夏译所增加的可能性很大。林英津推测,这句话有可能是西夏译者为了明确“立为师”的文意,并使事件的叙述完整,自行加入的一小段解释。不过,我们毕竟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说夏译底本不如此作。

(2)今本《武韬·军用》有“轴旋短冲矛戟扶胥,百二十具,黄帝所以败蚩尤氏。败步骑,要穷寇,遮走北。”黄帝以扶胥战车败蚩尤之记载,古籍中仅见于《军用》,西夏文本无此内容,很可注意。宋璐璐认为“盖西夏人所据汉文本已删此段”,^①似是。

三

根据以上所述,我们可以对西夏文《六韬》的文献价值加以概括并做进一步的讨论。

首先,如前面已经指出的,虽然西夏文《六韬》总体上属于今本系统,但它与北宋以来以《七书》为代表的官方颁行本在分卷、篇目上有较显著差异,文字也有所不同,因此它的底本与后者显然不属于同一个版系。由此可以确定,元丰年间《武经七书》颁布后,虽然具有正统和支配地位,但并没有立即完全取代其他版本,直到南宋时期还有一些与官本不尽相同的《六韬》流传于世。

其次,可以判定,夏译本不是宋明以来主要《六韬》版本的祖本并且较早亡佚。从上面所举异文例证可知,西夏文《六韬》和宋明时期其他主要版本相较,既有文字相同而异于《七书》本的例子,也有同于《七书》本而与他本不同的情形。但鉴于卷数、篇目的不同,西夏译本所据底本在版本亲缘上,显然比《七书》本与已知宋明时期主要版本的关系要远。也就是说,现存宋明《六韬》的主要版本来源应是《七书》本而非其他版本,这和我们以往的认识是吻合的。当然,这一判断有其特定含义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宋本《武经七书》,实际上是南宋孝宗或光宗时期的刻本。《施氏》本及明刊本应源自元丰刻本或其他较早续刻的《武经七书》而非孝、光刻本。这样才能解释有些《七书》本字误而《施氏》本及明刊本不误的原因,即因为该刻本错误,而元丰刻本未错。夏译本后继无踪,自然意味着夏译底本及他本宋时流传有限,而且很可能在南宋后期已经亡佚。这个结果,当然应是《七书》本的支配地位使然。这里还可以指出的是,聂鸿音、常璐璐已注意到,西夏人在翻译中原典籍时往往采用非官方、非经典著作作为底本^②,夏译《六韬》不以《七书》本为底本,乃是又一个例证。

第三,西夏文《六韬》还为探索唐宋时期今本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启发。宋代自元丰官本颁行后仍有数种《六韬》文本流传,西夏译本使我们

^①宋璐璐:《〈六韬〉西夏译本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硕士论文,第20页。

^②宋璐璐说见所著《〈六韬〉西夏译本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硕士论文,第3页。

得以看到其中一种的大致面貌,因而非常可贵,对我们进一步探索《六韬》在唐宋间的变迁有重要意义。以往笔者将何去非、朱服等人整理校定《武经七书》视为今本形成的唯一关键,认为在这前后《六韬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^①。现在看来,这种改变的程度和意义可能需要重新考虑。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,即在元丰官方定本形成以前,已经出现了类似或接近今本的某些版本,夏译底本或许即为其中之一。宋璐璐根据西夏文译本多出的两篇认为,西夏人所据的汉文本《六韬》底本似应早于《七书》本颁行^②,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从逻辑上说,元丰官本改变为多出两篇以上的夏译底本的可能性很小,而夏译底本校改为元丰官本的可能性则更大。如此说来,何、朱等人就有可能是在包括夏译底本在内的多个版本基础上完成对《六韬》的整理校定的。换言之,元丰年间的整理改定,其实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,其改变程度可能没有过去我们认识的那么大。这应是我们从西夏文《六韬》得到的最重要的认识。

第四,西夏文《六韬》在文字校勘乃至训诂方面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校勘方面,上面讨论异文时已对其校正今本之误、保存异文和了解译文底本面貌的意义有所说明,这里再对其训诂价值略做申论。

由于西夏文本从汉文翻译而来,因此当汉文理解可能有歧义时,译文实际上就体现了译者的一种取舍和解释,因而也就具有了训诂学价值。典型的例子如:夏译本《三家注孙子》将古代汉文兵书中常见的“卷甲”译为将士兵甲衣的下沿卷起,以提高步兵行军速度;将“衔枚”译为马匹而非士兵口衔木条,将“方马埋轮”译为“缚马埋轮”意为自置死地等等,都是迄今最为合理的解释^③。西夏本《六韬》中,也有这样的例子:如《虎韬·军用》:“天浮铁螳螂,矩内圆外,径四尺以上”,何为“铁螳螂”,以往注释都不得其解,夏译本为“浮舟铁锚”,使人豁然明白。

总之,西夏文《六韬》有其独特的文献学价值,今后《六韬》的研究和校释者,当然不能不充分注意和利用这一重要文本。不仅是《六韬》,西夏译其他汉籍如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孙子》、《三略》等,都是古籍研究的重要资料。在当前大批西夏文献多已获得公布和解读的情况下,夏译汉籍这个宝库,是古籍学者所不应忽略的。

本文承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彭向前教授大力帮助,谨此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邵鸿,男,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,南开大学、南昌大学兼职教授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军事史。

张海涛,男,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。

①徐勇、邵鸿:《〈六韬〉综论》,《济南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3期。

②宋璐璐:《〈六韬〉西夏译本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硕士论文,第6页。

③彭向前:《夏译〈三家注孙子〉研究》,未刊稿。